

代际社会学视角下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

■ 陆杰华 郭荣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新时代青年成长于重大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并形塑了独特的群体特征。本研究以“社会代”概念和“生命历程理论”搭建分析框架,强调宏观社会路线约束和个体生命历程间的互动作用,具体包括新时代青年群体共同经历了两大发展奇迹、教育扩张大潮、人口迁徙浪潮、互联网全覆盖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形塑了独特的人口和社会文化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应重点聚焦低生育社会下青年婚恋观和生育意愿研究、高社会流动下青年城市化路径与社会融入研究、数字化背景下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影响研究等议题,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青年群体 代际社会学 “社会代” 核心议题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2.014

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的青年工作的地位和青年发展作出了重要论述,即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特别强调,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2]。作为15—35岁年龄段的群体^①,青年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呈现了社会变迁烙印,且会在个体的生命历程演化中持续显现。同时,作为具有共同代际体验和受到相同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的新生代^②,青年群体形成了强烈的同辈代际认同和与前辈群体的代际差异。

因此,关注新时代青年群体发展的核心议题,准确把握青年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探讨青年个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既是“十四五”时期纵深实施《规划》十项目标和应对青年人口变动的现实要求,也是建立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平等互信的代际关系和建构具有动力、充满活力、释放潜力的和谐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的应有之义。本研究基于代际社会学视角,以“社会代”概念和生命历程理论为分析框架,突出中国本土经验与特色,以期系统考察新时代青年

收稿日期:2023-01-10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
郭荣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

① 不同机构或组织对青年的定义有所不同,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5—24周岁的人定义为青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区间确定为14—35岁。鉴于各国人口普查中一般将0—14岁定义为少儿人口,为了便于与国家宏观数据进行比较,本研究将青年人口的年龄范围界定在15—35岁,即出生于1987—2007年间。

② “中国新生代”指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主要是“80后”“90后”和“00后”群体。

群体拥有的独特社会背景和构成特征,深入分析嵌合于新时代青年成长不同阶段和领域的核心议题,提出进一步了解并引导青年的研究展望,从而为实现“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的发展目标提供参考借鉴。

一、新时代青年群体的社会背景和构成特征

市场、社会和网络是青年成长的基础与土壤,孕育了具有时代共通性和国别特殊性的青年成长环境及由该环境形塑的群体特征。新时代青年群体对应欧美社会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①,均受到互联网社会兴起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汤姆·库洛普洛斯(Tom Koulopoulos)等学者指出,互联网一代面临的全球性共同趋势包括,人口年龄分布从金字塔形转向摩天楼形^②以及年龄包容性的增强,社会关注的获得由基于财富转向网络和社群的影响力,走出课堂的新教育模式缩小了教育差距并实现文化跨界等六个方面^[3]。中国特有的国情伴随全球共同性因素折射到新时代青年的发展历程中时,也会带来特殊的影响。例如,依靠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生育政策领域的积极干预,我国婴幼儿和青年群体的因病死亡率和总人口出生率出现明显变化。相较于欧美大多数国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发生得更快、更早,伴随未来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摩天楼”上下一般粗的楼层数也会更多。

全球通性与本国特性并存的事实,使得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新时代青年群体的生命历程中,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一代生活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环境中^③,《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8万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同时,2021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安全感近五年持续保持高位,达98.62%^[5]。其二,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大学扩招等教育发展战略构成的教育扩张大潮。始于1999年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和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得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及,此两项事件分别与“80后”步入大学阶段和“90后”进入中学阶段的时期相匹配,使得青年群体的成长期恰好迎合了教育的大扩张时代。例如,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且已进入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6]。其三,高流动、多元化的人口迁徙浪潮。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2021年26.6%的变化过程,近十年每年新增流动人口占比接近1%,且参与流动的人员已经从最初的青壮年劳动力转为全员流动,“迁徙中国”形态业已形成^[7]。其四,互联网全覆盖与新媒体文化的兴起。1997年我国接入Internet 64K国际专线,开启了互联网的正式运行,持续加强的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使2022年我国网民规模达10.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8]。

青年群体经历的共同历史事件是塑造其集体记忆、惯习和价值观念的共同变量,考察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构成特征需要特别关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文化情境的作用。例如,有学

① 迈克尔·迪莫克(Michael Dimock)将出生于1981-1996年、伴随互联网浪潮兴起、在“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阴影中成长、深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群体称为“千禧一代”(Millennials),并将出生于1997-2012年、在互联网的高连通性和触网的低成本背景下成长的群体称为“Z世代”(Generation Z)。

② 金字塔形通常代表了经典人口分布趋势,即从低到高的各年龄段人口以相对标准的速度逐渐减少。摩天楼形指随着时代的发展,若以每5岁记为一个年龄段,除了临近预期寿命年龄段人口因为死亡而迅速减少外,每个年龄段占总人口的比重大致相当。即金字塔的中间部分逐渐变宽、顶端逐渐变尖细,在平面上将呈现出“摩天大楼”的形状。

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是基于对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作出的重大判断。

者认为,与以往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青年代际群体相比,当代青年表现出更广泛强烈的代际身份认同、普遍鲜明的观念和行为代际差异以及深远突出的社会影响力^[9];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具有网络化的生活方式、矛盾化的社会心态和扁平化的群体结构的群体特征^[10];中国“Z世代”文化特色包括从互联网中寻求社会认同、“421”家庭结构使其结果导向诉求更为强烈、“内卷”与“躺平”共存的矛盾现象等^[11]。

总体来看,新时代青年群体的人口、社会文化等特征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青年群体人口占比持续降低,受教育程度迅速提升,初婚年龄推迟和初婚结婚对数递减。15-35岁年龄群体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自2010年的33.51%下降至2020年的27.18%^[12],占全球青年人口的比例自1986年的峰值24.85%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16.43%,低于印度青年人口占比3个百分点^[13]。青年人口占比缩小所引发的结构性变化,与教育扩张大潮所创造的机遇耦合在一起,促使新时代青年成为高文化素质群体。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显示,“00后”群体中完成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达93.7%,相较前几代人有大幅度跃升;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代际差异也极为显著,“70后”“80后”“90后”群体中接受大学本(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别为15.1%、32.2%、51.5%^[14]。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和处于结婚适龄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时间延长,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有学者基于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了受教育水平与单身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5];同时因各年龄段青年人口规模的紧缩,导致每年登记结婚对数趋于降低,平均初婚年龄也在十年间推后了近四岁,2020年为28.67岁。

二是青年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大。流动的时代造就了流动的青年,近三十年青年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73.9%,人数达1.28亿人。同时,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逐步增高。例如,研究发现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完成了高中阶段教育^[16],与此相伴的是首次外出年龄的渐进延后和流动原因的多样化。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公共服务可及性等城乡间的差异,使得城市对青年的拉力逐步增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青年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达32.14%;镇次之(27.49%);农村青年人口占比则由2010年的29.6%降低到2020年的21.4%。

三是青年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相关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催生互联网青年文化圈层。作为“互联网原生代”的新时代青年群体,“80后”“90后”“00后”的触网率分别为90.6%、96.3%和98.6%,显著高于“70后”群体的76.3%。高度参与网络社交文化和拥有掌控网络的全方位能力,使得青年从传统代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推动了公共参与意愿提升、消费模式转型和家庭文化反哺现象的产生。同时,青年从互联网中不断满足其精神需求和寻求社会认同,也促进了网络青年亚文化圈层^①的演进与变迁^[17]。

四是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业态青年从业者,成为灵活就业人员中增长最快的群体。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经济迅速发展,催生出网络主播、网约配送员、全媒体运营人员等七类新业态^②。青年是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主力群体,当前的工作状态表现为月收入处于8000元以下,工作强度较高,20.4%的新业态青年每天工作12小时及以上,工作满意度略高于整个青年群体^[18]。

五是青年个体化趋势开始显现,脱嵌于原有的实体人际结构。伴随社会体制改革和现代

① 圈层是社交群体的一种具体形态,专指一些拥有相同或相似信仰、价值观、生活喜好的网络用户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自主选择而聚合成具有某种特定风格趣味、价值主张并彼此有层级之分的网络社群。

② 其他四类为新型职业农民、网络文学写手、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电子竞技员。新职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该职业必须拥有独立的专业技能;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

技术的兴起,生产的个体化和家庭生活的个体化^①趋势日益显著,它们成为影响青年人际结构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变量。青年群体通过网络创造出新的人际关系嵌入渠道,拥有独立的网络社交圈,在形式上逐渐脱嵌于血缘关系、原生家庭等。网络中的陌生人社会也使得人人都是交往圈的中心,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家庭结构的去权威化和扁平化的人际结构。

二、新时代青年群体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当前对青年群体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视角。一是结构视角,认为青年本身的出现和特征变动均是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产物,关注宏观社会经济变迁因素对青年的形塑作用。例如,迈克尔·迪莫克(Michael Dimock)根据西方重大社会变迁事件,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成长的青年群体依次划分为“婴儿潮一代”“X世代”“千禧一代”和“Z世代”^[19];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采用43个国家的实证数据阐释在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存在价值观念的代际更替和后物质主义转型现象,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20];周晓虹则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青年从一开始就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之间,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社会变迁改变了代际间的权力格局^[21]。二是文化视角,聚焦青年群体本身的显著特征,大多数基于经验描述或小型研究项目考察青年一代的社会认同、消费观念、行为模式、人际结构等,并比较代际差异及其形成机制。例如,李春玲提出,当前我国青年价值观变迁研究存在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代际社会学理论等四种视角,其中代际社会学是理解新生代群体特征的独特视角^[22-23]。

如前文所述,新时代青年群体在生命历程中共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并塑造了具有鲜明时代记忆的群体特征。本研究将基于代际社会学强调的宏观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历程之间的互动作用,构建分析框架并确定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核心议题。首先,“社会代”是代际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指因受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同龄群体^[24]。其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层级化群体,一个“社会代”在社会结构中因具有强烈的代际认同和与老一代显著的代际差异,而居于特定的代际位置。此概念不同于以生理年龄或“父代—子代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概念,即并不是所有的同龄群体都能成为“社会代”,“社会代”往往产生于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并且在变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此,新时代青年群体属于典型的“社会代”,既受到两大发展奇迹、教育扩张大潮、人口迁徙浪潮、互联网全覆盖等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成为进程中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并被打下代际烙印,在人口学特征、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特征上凸显出其与前辈群体的代际差异。

其次,生命历程理论为代际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分析框架。生命历程即个体在一生中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其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同时年龄的生物学意义是由社会建构的,年龄层级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期望。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年龄能够将人们置于社会结构和特定的年龄群组中,帮助了解社会变化在个体身上留下的烙印,从而建立起将社会需要与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相结合的视角^[25]。例如,有学者在该理论取向向下分析“改革开放一代”“新生代农民工”“独生子女一代”等^[26-27]。因此,基于代际社会学分析视角,以“社会代”概念和生命历程理论为核心,研究的分析框架如下页图1所示。

^① 社会的个体化体现为后工业社会中家庭生活的个体化和社会劳动的个体化,前者指以个人状态生活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后者指社会生产自主化、人机结合、白领化过程,使得仅需一人即可完成某个劳动过程的社会劳动趋势日益显著。

一方面,生命历程理论提出的年龄概念不仅关注个体层面的生命时间,并将其置入特定的同龄群组中;也强调宏观层面的社会时间,反映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实时影响,即社会对青年阶段有关事件发生的适当时间存在期望,例如求学、结婚和生育年龄等,体现了社会路线的约束性。个体的选择和行动对社会期望的解释反映了个人的主动性,同龄群组成员虽然可能经历相同的社会事件,但其生命历程却不完全协调同步。另一方面,因该年龄段群体产生于共同的重大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并形塑出独特的集体特征,使其位于社会结构中特定的代际位置,符合“社会代”概念的两个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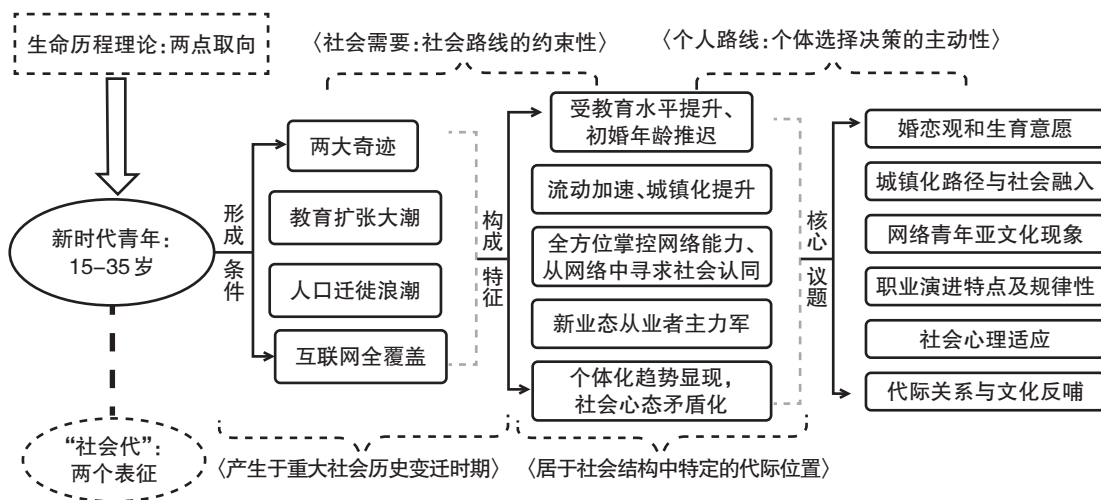


图 1 代际社会学视角下的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分析框架示意图

三、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应关注的核心议题

如图1所示,基于代际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重点聚集如下核心议题。

第一,低生育社会中青年婚恋观和生育意愿研究。当代青年的婚育困境表现在单身率高、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龄推迟、结婚登记人数连年下降、低生育意愿等方面。一方面,婚恋领域的“低欲望”是部分青年男女择偶需求异化的突出表现。大众传媒在推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兴起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得青年的恋爱观、择偶观和婚姻观发生了明显改变。自我解放、自我欲望满足成为两性交往的第一位需求,解构了传统保守的婚恋价值体系^[28]。互联网通过传播不合实际的爱情童话故事,促使部分青年不断提高在现实生活中的择偶标准,并且高度依赖电子产品、社交媒体等进行社会沟通也容易模糊虚拟社交和现实社交的区别,因此看似宽松随意的择偶观实际隐藏了高期望的具体指标化标准(如外貌、财富、职业、学历等)。另一方面,“少子化”或“无子化”现象源于“人类行为倾向沿着阻力最小方向前行”的动力机制。对人口再生产行为的逃避与生存压力加大和消费习惯的不可逆性紧密相关,相较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和心力导致消费降级的育儿行为,部分青年更倾向于选择避免家庭责任和减少个人麻烦的单身生活。因此,在研究如何解决青年生育意愿较低的问题时,除了需要关注经济、就业等外在环境因素,也不能忽视对青年自主性生育动机的分析,且需要提供心理学方面的干预。

第二,高迁移流动下青年城市化路径与社会融入研究。由于安土重迁的传统以及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二元分割,大多数流动人口处于“流而不迁”和“循环流动”的状态^[29]。青年流动

人口的城市化不仅包括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社会经济地位、采取相似行为模式的客观融入,也涵盖认可城市文化和城市居民身份的主观融入^[30]。与此相对应的城市融入路径首先体现为居所转移的城市空间融入,工作是流动青年与城市最主要的联系,青年可以通过提升职业地位、加大职业稳定性和参加社会保障等实现经济融入。其次是行为方式的城市生活融入,即青年对自身生活体系的重建,反映在其休闲方式深嵌于城市高消费的生活体系中,社会关系由以村庄地缘转向以业缘为主。最后是城市价值融入,将希望寄托在对下一代教育的高预期上,希望借助教育实现下一代的进一步城市化。除探索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路径外,关注新时代流动青年的内部特征并划分类别,也是逐步实现流动青年的市民化、增加其在城市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例如,有学者将青年农民工划分为成长型、稳定型和退出型三类,发现其劳动选择和就业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31]。

第三,数字化背景下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影响研究。青年是网络社会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网络圈层化^①的主要受众群体,如何处理好网络圈层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冲突,成为数字化背景下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新媒介为青年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圈层”交往。基于价值认知、话语逻辑、兴趣爱好等划分出“饭圈”“二次元圈”“电竞圈”等,不同圈层群体均将自身定位在一个满足情感需求和符合价值取向的小众圈中,通过新媒介提供的发声平台与技术支持表达观点。另一方面,各种青年亚文化群体被互联网激活,悄然“对抗”权威文化和消解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壁垒,解构既存文化类型的同时进行亚文化空间创设。例如,当前网络民粹主义在青年群体中不断发酵、传播和蔓延,表现在造谣、传谣、盲目崇信、“人肉搜索”等,具有离散社会共识、破坏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32]。

第四,数字经济时代青年群体职业演进特点及其规律性研究。当代青年作为“数字土著”,拥有运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的全方位能力,其数字素养水平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持久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演进规律与青年职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深层逻辑^[33]。一方面,新技术的大量使用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更多青年从业者的技能被激发和提升,并且技术、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同等重要的新生产要素,也降低了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改变了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能够帮助低收入青年群体拓宽就业渠道、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全球化激烈竞争和新技术加速迭代增加了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青年职业生涯发展模式呈现出“无边界”特征。如何提高职业适应性和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形成清晰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是新业态青年从业者必须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伴随青年灵活就业的比例上升以及工作短期化、项目化比例的提高,部分青年可能会形成“技能本位”的职业观,忽视了法律底线、劳动纪律、合作能力等职业精神的养成,导致青年职业发展后劲存在一定不足。

第五,社会转型期青年群体社会心理适应研究^[34]。重视对青年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的科学研究能够敏锐捕获社会运行的状况和存在问题,预见事态未来走势和有关需求。例如,“佛系”是当前社会转型期青年社会心态出现的具象表征之一,部分青年通过使用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以网络集群性行为和网络狂欢的形式宣泄对当前处境的不满。该现象反映出部分青年焦虑与妥协的心态,一方面是基于对当前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满、社会分配不公及自身利益相对剥夺等现象的消极应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些青年信仰的缺失,风轻云淡、无所坚持的生活态度易使个体淹没于人潮、迷失掉自我^[35]。因此,完善

① 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指在网络生活空间中由于信息获取定制化、个人社交圈子化、交互关系层级化而形成的一种只在自己特定圈层中进行信息交互的现象和趋势。

青年社会心理有关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促进制定与完善优化青年社会心理和推动青年全面发展的社会政策,尤其关注对该群体社会心理的纵向追踪性观测,以便发现并能够解释变迁规律和预先创造其良性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第六,家庭结构转型下代际关系和文化反哺研究。当前,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小型化、家庭户类型的多样化、空巢家庭的快速增长等现象体现了家庭变迁过程,在该背景下代际关系呈现出亲密化与疏离化并存的特点。一方面,孝道在家庭代际关系中仍占据核心地位。虽然孝道的实际表达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但青年一代还会受到“子女应对父母尽孝”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青年子女追求生活自主、摆脱家庭约束的意愿日渐强烈,主张实现个性解放和尊崇平权意识,使得传统亲代权威的实现越来越倚重于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内化。此外,青年群体在接受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方面存在相对优势,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文化吸收的文化反哺现象愈加鲜明。文化反哺与电子媒体之间关联密切,突出表现为青年向父辈进行文化反哺的能力部分源于其借助新媒体获取的信息优势和知识权威;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特征为子女一代挑战父辈一代权威提供了可能等^[36]。有学者通过探讨不同家庭代际经济关系中青年数字反哺行为的差异,发现代际经济关系越和谐、反哺活动越深入,“啃老”与“孝道”具有共生性^[37]。

四、代际社会学视角下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高度,关心青年成才、谋划青年工作的开展。如何更好地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38]。新时代青年群体成长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独特的集体特征,如何使代际的观念和行为差异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社会冲突的源头以及如何引导青年顺利完成社会化,均需要在代际社会学视角下,通过代际比较分析和代内差异分析,细致刻画群体分类特征,关注人口结构等特征对相关议题的影响,利用高质量调查资料探讨协调代际关系、拟合代际差异的路径,以实现青年工作的发展目标。基于代际社会学视角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代际效应与阶层效应双重作用下展开“社会代”分析框架。生命历程理论对个人路线的强调,体现了“近体过程”是最终决定个人生命历程的机制。但个体不是简单受制于社会路线的被动承受者,时空的影响力只有通过个体的选择决策才能渗透到生命历程的框架中。这体现在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的研究中,强调不仅要关注代际共性和代际认同,也不可忽视由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分层、阶层分化、体制分割等带来的代内分化。例如,新业态青年从业者中的数字蓝领(如快递小哥)与网络文化青年(如网络主播),两者的受教育水平、境遇状况、价值观念等差异明显,凸显了内部分化。因此,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历程不仅打上了代际效应的烙印,同时也印刻着社会分化的轨迹。

第二,精确群体分类标准,关注群像细描对刻画青年特征的作用。准确把握青年行为特征并探寻背后形成机制的首要条件是对人群的精确识别和类别归属,而非机械、笼统、粗糙地将其视为一个集合体。“社会代”概念所强调的将某一年龄群体视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特定代际位置的观点,关注的是群像特征,而有所忽视群像背后的差异化个体。在破解青年低生育现象的难题时,对该群体本身做更为细致和穷尽的分类,能够更接近低生育现象的成因。根据主观生育动机和客观生育条件可分为“不敢生(主观想生但客观条件受

到限制) ” “不想生(具备客观条件但无生育意愿) ” “不生(二者皆无的躺平者) ” “不能生(因身体疾病未能实现生育行为) ” 四类,每一类别群体的生育动力和阻力均存在差异。细化辨识施策对象后施以针对性干预,能够达成在满足政策接收者需求的同时提高政策效能这一双赢目标。

第三,重视新时代青年人口结构特征的变化对相关议题的影响。人口要素具有基础性地位,应始终作为发展中最核心的变量来考虑。青年人口的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特征,关乎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年龄和素质结构、区域均衡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社会发展议题。例如,当前女性青年规模减小与青年低生育意愿相互交织,对人口再生产形成不利影响,这会增加未来人口结构失衡风险;青年人口相对规模的缩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区域间青年人口发展的不平衡。

第四,完善大样本、连续性、高质量的调查资料以便做规律性和趋势性研究。现有研究一方面大多属于观点陈述和经验描述,缺乏全国性、连续性、大样本、高质量的调查数据资料分析佐证;另一方面,多数基于研究者个人或小团队实施的小型项目研究,难以对不同代际群体做系统全面的比较分析和趋势性研究。未来应在补充完善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学习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如APC模型、事件史分析等),以推进对机制性、关系性、历时性问题的探讨。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求是》,2022年第21期。
- [2]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1
- [3] 汤玛斯·辜洛普罗斯 丹·凯德生:《Z世代效应:改变未来企业经营的六股力量》,闫晓珊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36—40页。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gov.cn/shuju/2022-02/28/content_5676015.htm
- [5] 《全国群众安全感持续提升 平安中国建设续写奇迹》, <https://m.gmw.cn/baijia/2022-03/02/35556260.html>
- [6]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教体系》, http://www.gov.cn/xinwen/2022-05/18/content_5690915.htm
- [7] 段成荣 吕利丹 王 涵 谢东虹:《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再论中国人口迁移转变》,载《人口研究》,2020年第1期。
- [8] 《第5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n4/2022/0914/c88-10226.html>
- [9] 李春玲:《代际认同与代内分化:当代中国青年的多样性》,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
- [10] 何绍辉:《Z世代青年的形成背景与群体特征》,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
- [11] 王水雄:《中国“Z世代”青年群体观察》,载《人民论坛》,2021年第25期。
- [12] 张 翼:《中国青年人口的新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载《青年探索》,2022年第5期。
- [13] 周宇香:《中国青年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7期。
- [14] 李春玲:《社会经济变迁中的Z世代青年:构成、观念与行为》,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
- [15] 张 翼:《中国青年人口的基本特征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 [16] 刘传江 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载《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
- [17] 张铨洲:《“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
- [18] 《新业态青年发展状况与价值诉求调查》, <http://www.rmlt.com.cn/2022/0427/645817.shtml>
- [19] Pew Research Center. Defining Generations: Where Millennials End and Generation Z Begins, <http://tony-silva.com/eslefl/misc-student/downloadpagearticles/defgenerations-pew.pdf#:~:text=Unlike%20the%20Boomers%2C%20there%20are%20no%20comparably%20definitive,socialfactors%20that%20define%20the%20Millennial%20generation's%20formative%20years.>
- [20]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1971, (4).
- [21] 周晓虹:《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 [22] 李春玲:《我国青年价值观变迁研究的多重理论视角》,载《青年探索》,2020年第6期。
- [23] 李春玲:《代际社会学: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独特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
- [24] Pilcher, Jane. Mannheim's Sociology of Generations: an Undervalued Lega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3).
- [25]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 [26] 李春玲:《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27] 包蕾萍:《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 [28] 苗 国 黄永亮:《高期望择偶与低生育陷阱:当代青年婚育困境的社会学反思》,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 [29] 朱 宇 林李月:《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载《地理科学》,2011年第3期。
- [30] 董寅茜 何晓斌:《流动青年的雇佣方式和城市融入——基于包吃包住差异化效应的实证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7期。
- [31] 李超海:《年龄-劳动-技术视野下的农民工代际划分与就业选择》,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7期。
- [32] 吴金花:《青年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的发生机理及其消解:共情理论的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9期。
- [33] 黄庆平 张振华 吴轲威 周 阳 李 猛:《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演进与青年职业发展》,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9期。
- [34] 沈 杰:《青年的社会心理变迁:一种研究框架的探索》,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 [35] 卜建华 孟丽雯 张宗伟:《“佛系青年”群像的社会心态诊断与支持》,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
- [36] 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 [37] 陈雅赛 杨 艳 余淑妮:《“啃老”与“孝道”:青年与父母经济帮助关系中的数字反哺获得现象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 [3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s://www.ccps.gov.cn/xtt/202205/t20220510_153824.shtml

(责任编辑:刘 彦)